

德国

[美] 科佩尔·S.平森 著

近现代史

下 册

它的历史和文化

Modern

Germany



德国近现代史

它的历史和文化

下 册

〔美〕科佩尔·S·平森 著

范德一 林瑞斌 何 田 译

范 德 一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7 年 · 北京

下册目次

第十三章 战争和崩溃（1914—1918年）	425
1. “国会内党派斗争暂时中止”	425
2. 战时经济	436
3. 舆论、政党与战争目标	439
4. 与布尔什维克议和	453
5. 西线的崩溃	459
第十四章 1918—1919年的革命	473
1. 十一月革命	473
2. 政治权力的来源：苏维埃与临时政府	493
3. 无产阶级的分裂	501
4. 左派的造反行动	508
5. 巴伐利亚的内战	519
第十五章 魏玛国民议会	525
第十六章 共和国的政治，1920—1930年	548
第十七章 共和国的外交政策	561
第十八章 魏玛德国的经济生活	593
第十九章 魏玛德国的学术文化生活	603
第二十章 通往独裁的道路，1930—1933年	620
第二十一章 德国发了狂，1933—1945年	636
1. 阿道夫·希特勒的起家	637
2. 意识形态和“权力”	645
3. 纳粹主义的历史根源	665
4. 极权警察国家	672

5. 德国人的反抗	681
6. 通往统治世界和毁灭之路	687
第二十二章 从混乱到前途未卜：被占领的德国	707
1. 混乱	707
2. 雅尔塔和波茨坦	712
3. 纽伦堡审判	717
4. 非纳粹化和再教育	719
5. 自我反省	724
6. 东西方在德国的对抗	735
附录	
A. 1871—1912年历届国会选举	75 ⁷
B. 1919—1933年历届国会选举	761
C. 魏玛共和国历届内阁	766
参考书目提要	768
注释	771
索引	857

第十三章

313

战争和崩溃（1914—1918年）

痛哉，痛哉！美好的世界，您被摧毁。

——歌德

1. “国会内党派斗争暂时中止”

1914年秋的一天，瓦尔特·拉特瑙同冯·比洛亲王一起站在阿德隆饭店里，朝外看着宽阔的菩提树大街上的落叶。拉特瑙指向勃兰登堡门对亲王说：

难道象威廉二世皇帝这样一个具有如此引人注目的个性的君主，一个如此富于魅力和通情达理的人，一个完全不适合当统治者的人，再加上象贝特曼这样一个糟糕透顶的宰相和象法尔肯海因这样一个轻浮的总参谋长，能指望通过那道拱门凯旋归来吗？如果他能做到，历史将会毫无意义。¹

在1914年，几乎没有什么德国人象拉特瑙在那一天那样预感到厄运的到来。²当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两国之间的冲突发展成一场全欧战争时，除了极少数和平主义者外，全体德国人民都一致支持帝国政府。全国人民热情地、兴高采烈地欢迎宣战。³威廉二世8月1日宣称，“当国家投入战争时，一切政党应该停止争吵，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当然，泛德意志协会会员们在表达爱国的兴高采烈的情绪方面胜过所有其他人，对于同英国的谈判“已经失

败”这一点，他们毫不犹豫地公开表示非常满意。但是，这种民族热情的巨大浪潮还同样席卷了各党各派人士和各行各业的人。马克斯·韦伯在1914年10月15日给费迪南德·特尼斯写信说：“这场战争尽管极其可怕，但还是伟大的、了不起的。它是值得去体验的。”⁴

314 帝国会各政党达成了名为“国会内党派斗争暂时中止”的政治休战。在战争时期，所有历来的党派分歧被压下去了，大家同心协力都来支持政府进行战争。根据这一点，国会也在战争时期把它的权力让给了军方。它批准了政府所要求的军事拨款之后就休会了。各资产阶级政党会采取这种行动是人们已经预料到的，但对社会民主党将怎么行动则有许多猜测。国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历来总是投票反对政府的每一项预算，因为它包括军事拨款在内。问题是：他们在这危急时刻将怎么办？可是，社会民主党人也被席卷全国的那种爱国浪潮所淹没了。为了证明自己立场的正确，他们起先把敌意集中在反动专制的沙皇俄国，称它是德国的头号敌人、是对世界文明的一种威胁。在党的核心会议上，在到会的九十二人中，只有十四人投票反对国会批准军事拨款。包括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内的全体社会民主党人为了执行关于在国会中必须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投票的党的传统纪律，在8月4日一致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国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发言人胡戈·哈泽尽管个人也有保留意见，但还是在国会里宣读了党的声明。他说：

今天我们面临着残酷的战争现实和敌人侵略的可怕威胁。需要决定的不是赞成或者反对战争的问题，而是用什么必要的手段去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对被征入伍的兄弟们，不论他们属于什么党派，都衷心表示最美好的祝愿……万一俄国的专制主义取得胜利，我国人民及其未来的独立就会受到严重的、即使不是全部的损失……因此，我们

将按照我们经常强调的那样行事：在祖国遇到危险的时刻，我们将不抛弃它……我们谴责……一切并吞的方式。我们要求，一旦我们的安全目标实现了，我们的对手愿意媾和了，就结束战争，缔结和约，以便与邻邦友好相处……在这些基本原则的指引下，我们同意所要求的拨款。

1914年12月2日，哈泽以本党名义重申了同样的立场。那些过去一直被看作“德意志帝国的敌人”的人们所表现的这种民族团结精神在全国激起了被叫做“8月4日精神”的爱国热潮。总参谋部动员计划中要求逮捕所有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那个部分并没有执行。1914年9月2日取消了在军事单位取缔社会民主党印刷品的禁令，《前进报》现在也在铁路沿线的所有书摊出售。工会方面则停止了一切罢工。德国南部社会民主党最能干的领导人之一路德维希·弗兰克当时四十岁，是一个犹太人，也参了军，“以便使他的党在8月4日所表示的态度不致被说成是虚假的热情，仅仅是漂亮话”。几个月后，他在作战中牺牲了。

315

鼓动民族仇恨的宣传运动，象在所有其它交战国那样，在德国也很快地展开了。⁵报摊上出现了一些印有口号的明信片，例如：“一枪干掉一个俄国佬！”“一刀捅死一个法国佬！”“一脚踩死一个英国佬！”“一拳打死一个日本佬！”文学界和学术界的主要人物也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充满仇恨的战争。社会民主党人集中火力向沙皇俄国开火，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者则参加对英国的连续不断的谩骂，这种谩骂在恩斯特·利绍埃尔的《仇恨颂》中达到了顶点：

江海仇恨，大地仇恨；
心中的仇化为手上的恨；
无论爱或恨，我们犹如一人；

只有英国是我们的敌人。

受尊敬的学者如阿道夫·冯·哈纳克、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奥托·吉尔克和韦尔纳·桑巴特同背叛的英国人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一起参加了这个仇英大合唱。神学家哈纳克写道：“我们的文化一直是依靠三个民族来保存，即我们自己、美国人和英国人。现在只剩下两个民族了，我感到很羞耻。”伟大的古典学者维拉莫维茨写道，英国是“主要的煽动者，是把这场战争从地狱中呼唤出来的恶魔，是邪恶与伪善的魔鬼。”“法治国家”的著名倡导者吉尔克写道：“同你们的斯拉夫和高卢同伙一起往前猛冲吧，你下流的民族！不忠的英格兰，决不许你篡改上帝的判决。”有些人同意德国军国主义的指责，并为此感到扬扬得意，欢欣鼓舞。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韦尔纳·桑巴特写了《商人与英雄》这部书，把这场战争解释为商人与英雄之间的斗争，英国商业文明的实利主义、理性主义和讲求实际的精神与德国英雄的战斗的、勇敢的武士精神之间的斗争。桑巴特写道：“这就是为什么对我们富于军国主义精神的人来说，这场战争是神圣的，是的，它是地球上最神圣的事情。”⁶天主教哲学家马克斯·舍勒在自己的文章《论思想和目的的军国主义》中同样不想驳斥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指责，反而引以为荣。舍勒煞费苦心地把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德国的敌人的军国主义加以区别。他说前者是“德国精神气质”的表现形式，是一件“艺术品”，而后者只是用来对付敌人的一种“功利主义”工具。⁷

九十三名德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和艺术家发表了一项宣言，答复关于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和挑动战争的指责。宣言说：“如果我们没有在比利时先下手，那就等于自杀。”他们拒绝了

关于德国犯下暴行和违反国际法的一切指责，并得意地宣告“德国军民是一家”。签名者中有阿洛伊斯·布兰德尔、卢约·勃伦塔诺、里夏德·德默尔、阿道夫·戴斯曼、保罗·埃尔利希、鲁道夫·欧肯、海因里希·芬克、埃米尔·非舍尔、路德维希·富尔达、弗里茨·哈贝尔、恩斯特·海克尔、阿道夫·冯·哈纳克、格哈特·霍普特曼、恩格尔贝特·洪佩尔丁克、马克斯·克林格尔、保罗·拉班德、卡尔·兰普雷希特、菲利普·莱纳德、马克斯·利贝曼、弗朗茨·冯·李斯特、爱德华·迈尔、弗里德里希·诺曼、马克斯·普朗克、马克斯·赖因哈特、阿洛伊斯·里尔、威廉·伦琴、古斯塔夫·施莫勒、赖因霍尔德·泽贝格、马丁·斯潘、赫尔曼·祖德尔曼、汉斯·托马、威廉·特吕布内、卡尔·福斯勒、西格弗里德·瓦格纳、费利克斯·冯·魏恩加特纳、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威廉·文德尔班德以及威廉·冯特——这真是世界上文学、音乐、绘画、哲学、科学和学术生活方面的一些最伟大人物的赫赫名单。这些人物代表着所有的政党，也代表了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人。

德国的反战情绪起初只限于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中心的一小批革命者、象赫尔曼·海塞⁸那样的几个和平主义作家以及一批和平主义教授，这些教授后来在1915年组成了新祖国同盟，谋求通过妥协来获得和平。这些人中包括研究英国文学的慕尼黑大学教授恩斯特·西佩尔，历史学家和《卡利古拉》作者路德维希·奎德，研究国际法的瓦尔特·舒金教授和汉斯·韦贝格教授，普鲁士军国主义的英勇反对者弗里德里希·威廉·弗尔斯特和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尼古拉以及在当时还比较不知名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黑尔穆特·冯·格拉赫是和平主义新闻界的一位勇敢而富有战斗精神的喜欢单干的人，为了使德国的

外交政策受到清醒的和批判性的分析,他创办了《星期一世界报》;他还发起了争取和平的斗争,这一斗争后来由卡尔·冯·奥西茨基继续进行。可是,这些和平主义者的呼声却被淹没在全面迸发的爱国热情以及德军在战争初期取得辉煌胜利所引起的欢欣鼓舞气氛之中。只是由于德国军队未能使战争速战速决,接着旷日持久的战争又带来了紧张局势和厌战情绪,最后大多数群众才被争取到和平事业方面来。1914年8月,大多数德国人认为,在同年圣诞节前战争就会结束。人们不大懂得马恩河战役对阻止德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意义,舆论界也不大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经过很长时间,军事局势的真相才完全彻底地暴露出来。

317 战争爆发时,冯·小毛奇^①任德军总参谋长。他是一个没有胆量的人,一向感到自己不称职。他犯了背离施里芬计划的战略性错误,这个计划不仅要求在六个星期内在西线取得决定性胜利,而且还要求从阿尔萨斯—洛林作战略撤退。毛奇把一支庞大的军队调到洛林,以阻止法军侵入德国领土。9月5日至12日的马恩河战役使施里芬计划所要求的速战速决完全不可能了。1914年9月14日,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接替了毛奇,但他也好不了多少。直到两年之后,才从东部前线调来了英明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班子去指挥仍在打胜仗但已大为削弱的德国军队。军界和政界领导人都曾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短期的战争。德国人民群众的民族责任感虽然十分强烈,足以在迅速取胜的前景开始暗淡下去时仍使她们保持步调一致,但是,战争初期的热情已开始减退了,8月4日的民族团结开始出现了严重的破裂迹象。

^① 冯·毛奇(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 Moltke, 1848—1916年), 一称小毛奇,德国将军,老毛奇(参看本书边码第138页的译者注)之侄,1906—1914年任德军总参谋长。——译者

战争的延长使最高军事司令部成为战争结束前德国的实际独裁统治者。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班子首先以在东部前线取得的辉煌军事胜利而一举成名并赢得了全国的信任，他们迫使皇帝在1916年8月29日解除了冯·法尔肯海因将军的总参谋长职务。据说，鲁登道夫曾到皇帝那里说，如果不剥夺法尔肯海因的领导权，几个月后军队的士气就会瓦解。威廉被迫屈服于两位将军的意志，任命兴登堡为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为第一军需总监。这个班子有兴登堡提供声望、尊严和传统，又有鲁登道夫提供旺盛的精力和巨大的干劲，现在不但掌握了军事指挥权，而且还实际掌握了一切重大的政治决策权。皇帝完全退居幕后。尽管他在宪法上拥有国家元首和最高军事首脑的地位，但是，在这两项职务上他都无法行使领导权。他在战场上设立了自己的司令部，但是，他的阿谀奉承的仆从和大臣们只向他报喜不报忧。中央党领导人埃尔茨贝格说，他从罗马回来后，在1915年3月1日觐见皇帝之前，有一位副官曾来对他说：“请你只向陛下报告好消息，好吗？”⁹

皇帝的朋友和心腹阿尔伯特·巴林曾一再试图使皇帝听取自己的意见，了解真实情况，但都失败了。他发现皇帝是生活在“愚人的天堂”，他的知心朋友深信，如果让威廉了解到真实情况，其精神就要完全崩溃。结果是真正的决策者几乎完全不把威廉放在眼里。这一时期皇帝在电报上的旁注表明，威廉在最高司令部经常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去瑞士向协约国代表进行和平试探的德国经济学家埃德加·雅费对美国人乔治·戴·赫伦说：“威廉皇帝现在只在德国的敌人那边出了名，而在德国本土，他已被人们完全撇在一边，或者不如说已作为一个无能的蠢人被扫到一边了。在德国，没有人再谈论他；在政治上，他已不复存在；在柏林，甚至在形式上也没有人同他商量问题了。”¹⁰

在战争的大部分岁月里，德国的真正统治者是最高司令部里无情的、顽固的和精悍的成员鲁登道夫。鲁登道夫并不满足于战争中的军事指挥权。他干预民政的一切重要方面。他插手劳工政策、食品问题和原料问题，并任命和罢免大臣。正是鲁登道夫迫使贝特曼-霍尔维希辞了职，正如他迫使外交大臣冯·屈尔曼辞职一样。虽然他是克劳塞维茨的信徒，然而，他并没有领会克劳塞维茨关于政治和军事的关系问题的真正意思。他未能理解战争只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要政治领导人服从军事观点是荒谬的。他是一位卓越的战略家、生气勃勃的组织者和努力不懈的行政官员，对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但是，正如汉斯·德尔布吕克所指出的，他基本上是被一种极端利己主义和刚愎自用的性格所驱使，以致他不能撇开自己在局势中的作用和自己的意志来客观地估计局势。鲁登道夫断然拒绝服从政府，反而迫使政治领导人屈从于自己的意志。那时，没有卓越的政治人物能以自己的意志与最高司令部的意志相对抗。正如劳合乔治所说，在德国没有象克雷孟梭、甘必大^①或庇特^②这样的人物。

贝特曼-霍尔维希在1917年被鲁登道夫赶下台后，接替他的是一位平庸的普鲁士官僚米夏埃利斯，他由于在担任普鲁士粮食行政官期间的活动而引起了一些注意。米夏埃利斯的宰相职务后来又 被巴伐利亚人赫特林所接替，赫特林对最高司令部抱有一种近乎幼稚的信任。德国取胜的一切希望都集中在最高司令部那里，

^① 甘必大 (Leon Michel Gambetta, 1838—1882年)，法国政治家，共和派首领。由于为政治犯辩护而知名，1869年被选为议员。1881年，曾短期担任总理兼外长。——译者

^② 庇特 (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年)，英国政治家，曾任财政大臣、首相等职。——译者

只要他们似乎能够取胜，很少会有人愿意对他们的威信或权威表示异议。只是到了战争结束后，德国政界领导人才敢于透露真相。埃尔茨贝格于1919年7月25日在国会说：“有四年时间，德国实际上没有政治统治，而只有军事独裁，对这一点，我们现在可以公开讲了。”¹¹

战后，调查德国失败原因的国会委员会提出了下述获得多数 319 同意的有关最高司令部活动的报告，这篇报告对局势作了公正的评价：

最高司令部总是充分相信他们是在为全国的幸福而工作。这个信念与他们的军事观点是一致的，因此，只要这个信念看来还是有理的，他们就会表达这样一种看法：要争取军事上有利的和平，后来则变为至少要争取一种可以忍受的和平……直到最高司令部本身也承认不可能取胜为止，政府一直信赖它的判断。因为政府没有一个能与最高司令部的意志相对抗的人物。¹²

在议会制度下，只有国会这个机构能够向最高司令部的权力进行挑战。但国会没有做到这一点。甚至就是在失败前夕，政府最后战胜军方也是由最高司令部精心“安排”的。国会未能应付局势，这就是布雷特博士在提交给国会调查委员会的关于德国内政的长篇详细报告中所提出的主要论点。¹³ 1914年8月4日“国会内党派斗争暂时中止”的决议，把国会中一切政党都团结起来支持政府进行战争。这种“国会内党派斗争暂时中止”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17年国会通过和平决议时为止。国会的政党领导人被带到前线去，由军事领导人带领他们参观，有时还受到皇帝的接见。可是，甚至在他们意识到了最高司令部的乐观说法和希望与实际局势的严重情况不一致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或很少做什么事来改善

局势或引起舆论界的注意。^①

1916年5月25日，独立社会党议员威廉·迪特曼在国会发表演说，呼吁国会采取“强硬”态度来行使自己的权力，投票结束戒严状态，要求恢复人民的宪法权利。迪特曼说：“任意行使权力的现象和无政府状态在全国盛行。法律象蜘蛛网一样被撕得粉碎，武力统治取代了法治。”迪特曼向议员们说：

320 在将来，你们不能说：“我们对这一切没有责任！”不，亲爱的先生们，人民将有权要你们这些人民代表对国内的情况负责。国会有义务用它所拥有的一切议会手段强行恢复法治……难道人民的合法的宪政国家已经向帝国主义的军事独裁完全投降了吗？难道国会已经在它面前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吗？难道国会已经成了它的一块遮羞布吗？¹⁴

只有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各集团投票赞成独立社会党人关于结束戒严状态和恢复政府权力的决议。

国会各政党在1917年要求罢免贝特曼-霍尔维希，可是，只是由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以辞职相威胁，这位宰相才被真正罢免。

对米夏埃利斯的任命，并没有同国会各政党领导人协商。只是到1917年末，随着对冯·赫特林的任命，国会领导人在政府中才不只是扮演一个有名无实的角色。国会在1917年通过了著名的国会和平决议，这是它坚持政治独立地位的最重要的表现，但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项决议被后来的行动一笔勾销了。

战争时期国会中的政党包括了由保守党和自由保守党组成的右派，由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和独立社会党组成的左派，以及由几乎

^① 恩斯特·特勒尔奇讲述了卡尔·黑尔费里希怎样在国会委员会里最尖锐地攻击了最高司令部所实行的无限制潜艇战的计划，然后又热情地投票赞成它。当黑尔费里希被问到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时，他回答说：“这是我在理智上所作过的最重大的牺牲。”（特勒尔奇：《旁观者信札》（蒂宾根1924年版），第3页。）

总是倾向右派的民族自由党和倾向左派的进步党组成的中间派。如德国政治生活所经常表现的那样，中央党是最后决定问题的关键所在，可是，正如布雷特博士指出的，它并没有坚持一种坚定不移的政策。它同右派一道支持无限制潜艇战，然后又向左转，支持和平决议，然后又向右转，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支持最高司令部。布雷特博士下结论说：“我认识到，只有两个政党保持一贯的政策。首先是保守党人，他们丝毫没有偏离自己的路线；其次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也始终如一地执行自己的路线。可是，无论是保守党人还是社会民主党人，都没有可靠的同盟者，因为国会里的中间派来回摇摆。当战争不走运时，他们就同意一项和平决议；当前线形势好转时，他们又再次向右转。”¹⁵

布雷特博士对国会的指责和迪特曼在战争期间的呼吁当然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即国会按照宪法规定是一个统治机构。但是，即使在正常的和平条件下，情况也不是这样。因此，国会无论从其传统或是从其法律地位来说，都无法与最高司令部的专制独裁相抗衡。它的讨论和发表的意见之所以重要和令人感兴趣，主要是由于它表达了舆论界的动态。真正的最高权力是掌握在最高司令部手中，鲁登道夫在夺取和行使这一权力方面尤其表现得果断坚决。

最高司令部实行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对凡是会引起人们对德 321
国是否会取得最后胜利发生怀疑的新闻，都加以扣压。然而，军事领导人却不懂得宣传和心理战。几乎每天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只谈胜利。失败的消息或者被完全扣压，或者用一种只有少数内行才能看出真相的方法报道出来。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德国完全封锁了1914年马恩河战役的真实结果。关于这个关键性战役，最高司令部允许德国公众了解的只是如下所述：

在西部前线,军事行动已经导致了一场正在顺利进行的新战役,现在还不可能发表关于那些军事行动的详细情况,敌人通过各种手段正在散布的我方失利的报道都是不真实的。¹⁰

著名经济学家卢约·勃伦塔诺说,当他在1914年9月底到达意大利佛罗伦萨时,他感到特别忧伤。在那里,他第一次听到关于这场决定性战役的真实情况。四个星期后,他回到慕尼黑,他以为自己的所有同事这时都已了解到一切有关情况,然而,人们却把他当作一个轻易上了敌人宣传的当的人。即使民间最高阶层人士,也只听到一连串的不断炫耀胜利的报道以及德国将从战争中获得很大好处的诺言;而会引起人们严重关注的一切迹象,都对他们完全封锁了。军事检查当局禁止对挨饿受难的德国人民表示同情。关于缺少吃穿或其它物质匮乏的一切描述,都在禁止之列。官方的格言是:“我们是任何人也打不败的!”

对舆论的这种操纵,造成了人们怀着没有事实根据的信心这样一种危险状况。有些人开始怀疑,既然这样连续不断地打胜仗,为什么战争还会持续这么久?有趣的是,更多的人还要在晚些时候才开始怀疑。当失败最后确实来到时,德国人民由于一直被蒙蔽,以为全面胜利已经在握,因而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对全线崩溃的消息感到迷惑不解。保守党领导人冯·海德布兰德听到要求停战的消息时,来回地边跑边嚷:“我们受骗了。”

2. 战时经济

从经济上、政治上和心理上说,德国是不能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在历史上,德国军队经常以漂亮的迅速行动赢得决定性胜利。弗里德里希大王进行的战争、1866年的六周战争、1870年的

迅速胜利都使德国人民在1914年也指望能速战速决。当这一希望落空时,厌战情绪就开始产生了,也大大削弱了民族的耐力和元气。

从经济观点看,进行持久战对德国显然不利。它依靠进口粮食、油脂、石油和硝酸盐之类的战略性化学制品来满足本国多种基本需要。人力缺乏现象也开始不祥地出现,并最终证明它是德国战争机器的致命弱点。德国能坚持打这么久,说明战争诱发了人民及其领导人的民族纪律性、科学独创性和惊人的组织能力。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们创造了用代用品来代替德国战时经济所得不到的供应品的英雄事迹。德籍犹太人科学家弗里茨·哈贝尔改进了从空气提炼硝酸盐的制作方法,使德国可以不必从智利进口硝酸盐就能制造炸药。人造氨的产生更加完善,纤维素也被制成棉花的代用品用以制造炸药。可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军方把国家整个经济都组织起来为战争机器服务——这就是所谓的战时经济。德国的经济在1914年是比较自由化的经济,到1918年则变成了彻底军事化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受到政府的控制和调节。¹⁷ 负责供应全国人民食品的一个战时机构(“战时粮食局”)成立了,它控制物价,调节消费。K种面包(战时面包)不得不用混合着诸如萝卜和土豆这些代用品的面粉来制造。1915年1月25日规定:每周两天不吃肉,建立定量配给制度,实行发面包卡的办法。

“战时经济”最具有深远意义的方面是有关原料的供应和“战时原料处”(KRA)的成立。主要负责建立这个机构的瓦尔特·拉特瑙。拉特瑙后来叙述了德国战争史中这一段戏剧性的经历。¹⁸ 他说,英国对德宣战后三天,“他再也憋不住了”,他到陆军部去了解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保证原料的充分供应。8月9日,冯·法